

● 周国林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编

Zhangsunhui Bainian Danchen Jini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ji

九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

息遘之旨於勤勞工作之餘善愛養其精神俾益奮厲不懈
競展其才以效力于國則為利之溥豈有涯涘斯閣之建為不
張舜徽百年誕辰紀念
三年之內修舊補廢治垣造亭諸役費工與所建同為九多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集
助焉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周国林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编

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

Zhangshunhui Bainian Danchen Jinti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ji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周国林主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622-4963-4

I. ①张… II. ①周… III. ①张舜徽(1911~1992)—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9404 号

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

© 周国林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建英

责任校对: 张晶晶

封面设计: 甘 英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室: 文字编辑室

电话: 027—67863220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827 千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9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定价: 8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张舜徽(1911—1992)

贺 信

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组：

敬悉贵校举办“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深感意义重大，谨致以热烈祝贺。

舜徽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学术前辈，在传统“小学”领域造诣精深，与章黄学派学者有广泛交往。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训诂学会在武汉成立，张老予以鼎力支持。此后我多次在学术会上得谒先生。1985 年，“许慎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漯河市举行，他以 74 岁高龄前往，并作重要发言。1987 年，我又获张先生之召，前往贵校主持博士论文答辩，再度闻教。往事在目，长者风范永难忘怀。

舜徽先生一生沉潜书海，气象博大，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遂于四部均有传世之作，是 20 世纪后期公认的国学大师。尤为可贵的，是他对社会、对祖国文化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孜孜不倦创作适合普通民众需求的《说文约注》、《中华通史》，这种人文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是当今学人的楷模！

这次研讨会，我本拟附骥。但适逢出访，失去向与会诸公学习的机会，至为遗憾。特恭奉函祝贺并祝各位学者诸事胜意，身体健康。

许嘉璐 敬贺

2011 年 6 月

目 录

良师·难友·芳邻

——难忘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	章开沅 1
怀念张舜徽先生	朱祖延 7
向张舜徽先生学习什么	熊铤基 10
舜徽先生二三事	冯天瑜 14
缅怀张舜徽先生	王建辉 16
一次难忘的记忆	马良怀 21
点点滴滴忆大师	杨逢彬 26
秋 的 思 念	
——回忆父亲张舜徽先生	雷爱华 张伯申 30
冬阳和煦忆慈父	张 安 38
若弩马之耐劳 如贞松之后凋	张 屏 48
对父亲的怀念不因岁月而逝	张 易 51
展关爱之怀 引精神之路	张 勃 57
张舜徽先生对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重大贡献	崔曙庭 62
学会发展忆会长	张家璠 70
一次难得的名师荟萃	
——1983—1984 年张舜徽先生主持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班忆旧	刘重来 74
一部论著稿 十年关注情	
——张舜徽先生与《雪堂学术论著集》	王同策 88
永守遗书传后世 欣观绪论忆先生	雷树德 98
忆导师张舜徽先生	施和金 101
门墙散记	彭益林 106
岁月映照大师的光辉	张三夕 109
张舜徽与 20 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	谢贵安 122
学者生命力之源：人文关怀	
——读张舜徽先生《顾亭林学记》	周光庆 134

顓孙治学特点述略	王武子	142
张舜徽先生治学之通核思想		
——以《清代扬州学记》为例	吴琦 王玲	148
张舜徽先生与近代湘贤的交谊	李绍平	153
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湖湘情结	伍成泉 贾海鹏	163
张舜徽先生生平与早年著作述略	王余光	174
君子之于学也		
——《张舜徽壮议轩日记》读后	傅道彬	187
始登上庠 壮议振俗		
——蓝田国师时期张舜徽先生的教学科研成就	周国林	204
张舜徽先生经学思想述	董恩林	220
浅论张舜徽先生的礼学成就	方向东	240
论张舜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点	刘国盛 王 闯	244
张舜徽先生方志学理论述论	赵 振	254
张舜老与敦煌学	王继如	261
张舜徽先生文论三题	谭佛雏	268
张舜徽先生在新时期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周少川	277
试论张舜徽文献学理论建设成就	徐有富	287
重读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	舒大刚 钟雅琼	296
从《中国文献学》看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	顾志华	302
清代扬州学派对张舜徽先生文献学思想的影响	姚伟钧 程 磊	309
由《汉书艺文志通释》看张舜徽先生的文献学思想	高华平 罗蔷薇	313
试述张舜徽对《周易》的研究与贡献	王玉德	320
张舜徽先生的《诗经》研究	刘立志 胡莲玉	330
《管子四篇疏证》述论	张固也 王木香	334
张舜徽先生对汉代诸子的研究	李晓明	344
《说文解字约注》的历史文献学视野	刘韶军 高 山	355
《说文解字约注》探述	范新干	366
张舜徽先生与宋史研究	罗家祥	370
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朱子情结	朱杰人	385
试论张舜徽先生的理学观		
——以《爱晚庐随笔》为中心	吴建伟	389
张舜徽先生对朱熹朴学的评价	肖海燕 刘美文	395
读《清人笔记条辨》札记	李学勤	400

一部研究清代学术文化不可多得的著作

- 读《清人文集别录》 仓修良 404
- 读《清人文集别录》 郭润涛 410
- 《清人文集别录》与 20 世纪以来清人别集目录的编撰 郝润华 景雪敏 415
- 读《清代扬州学记》札记 卞孝萱 423
- 张舜徽评章学诚
- 读《文史通义平议》 施 丁 431
- 张舜徽先生与戴震学术 徐道彬 438
- 试论张舜徽先生对戴震学术的研究 陈冬冬 447
- 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构
- 论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 戴建业 453
- 张舜徽先生《四库提要》批评条辨
- 《四库提要叙讲疏》读札 周春健 472
- 张舜徽《广校雠略》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 20 世纪上半叶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学科思考 霍明琨 492
- 《广校雠略》在张舜徽学术著述中的地位 鲁 毅 李华斌 499
- 张舜徽先生清代学术研究的成就和特点 杨绪敏 509
- 清代学术史中的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
- 钱穆与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许 刚 517

体例独特别识心裁的通史新著

- 评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 赵吉惠 536
- 评史应从大处着眼
- 读《爱晚庐随笔·学林胜录》札记 张 积 543
- 张舜徽先生《艺苑丛话》发覆 杨 昶 王 蕊 560
- 大师写作的史学专业入门书
- 读张舜徽先生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汪受宽 573
- 初学入门之蹊径
- 读张舜徽《初学求书简目》 何小平 578
- 张舜徽先生学术著作在台湾的传播 赵飞鹏 586
- 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教育意蕴 徐 梓 594
- 通人之学 博大之书
- 《张舜徽集》出版记略 范 军 冯会平 608

良师·难友·芳邻

——难忘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

章开沅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张舜徽先生百岁寿辰。真所谓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往事并非如烟，思念依然绵绵。

一、良师

余生也晚，与舜徽先生初识，是在1950年。那时，中原大学刚刚分设政法、教育、文艺等学院。我们教育学院暂时利用千家驹校区，只有政治、教育、历史、俄语4个系，领导与教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原中原解放区来武汉的“南下干部”。根据中央方针，中原大学开始从干部培训学校向综合性正规大学转型，但是当时教师队伍却严重缺乏，所以当听说张舜徽教授即将前来任教时，大家真是喜出望外。

舜徽先生是“组织分配”来的。因为他此前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已经过初步“思想改造”，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同于旧大学留用人员。他来教育学院报到以后，是我经手帮他安置在政治研究室那栋二层小楼楼上西侧，至少在我心目中他已经进入新型人民教师队伍。由于家眷未来，他的政治学习、工作与生活，都与我们这些年轻人打成一片。

那几年政治运动不断，舜徽先生很难发挥自己专长，所以我们也摸不清他学问的深浅，因为他的著作在解放前正式出版的不算很多，而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早期各系仍以中学政治、教育、历史等课的在职教师短期培训为主，课堂上讲的都是基础知识，最注重的又是所谓立场、观点、方法。这些当然不是舜徽先生的长处，但他毕竟经过革命大学政治学习，不仅虚心改造，而且颇能顺应潮流。记得我们每天早上的政治学习是社会史，他结合中国文字流变阐明劳动创造世界，用毛笔端端正正书写学习心得，足足有厚厚的一大本。大家（包括王自申院长）看了都非常欣赏。

1951年暑假，我们随同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而且迁入昙华林。但是学校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转入教学正轨，而是全体师生都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历史、教育、物理、数学等系分配到青山区13个乡，住处相当分散。我因为被留在土改大队部当秘书（分管宣传），整个土改期间都难以与舜徽先生见面。只是听说他工作积极，情绪甚好，能

与群众打成一片。那时他才40岁，一向又勤劳耐苦，自然有良好表现。土改结束以后，教师都回校复课，他主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做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并开风气之先，因此在校内外逐渐赢得好评。但1952年教学并非学校工作中心，思想改造才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不知道什么原因，思想改造中，我被分配到地理系，与历史系反而隔开了。当时历史系教师分别来自几个学校，彼此都不大熟悉，反而不如地理系是清一色“老华大”，共事已久，相知较深，气氛也比较和谐。听说历史系有的学生比较过激，甚至把进步教授送子支边等感人事迹都说成是“自我表现”，加上校报和广播台任意点名批判，使得有些教授惶惶不安，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华中大学原来是外国教会办的，已被定性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原华中大学领导成为全校批判重点，而原华中大学教授（包括解放前比较进步者）也就不同程度地受到牵累。舜徽先生是真正的“外来者”，加以已经有过“思想改造”的训练，比较容易适应这种环境，且历史清白，从未介入政治，遂得以顺利过关。

总起来说，直到1957年为止，舜徽先生在校内还是较受重视的。因为他经过“革命大学”陶冶，而且是从“中大过来的”，被主要领导看做是“自己人”。杨东莼院长对他极为重视，亲自介绍他参加民主促进会。他教学效果特好，在校内外已是有口皆碑。特别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他那些厚积薄发的学术佳著连续出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后经修订再版改为《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更成为风行全国的大学教科书，大大提高了他在学术界的知名度。

当时，华师历史系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但真正堪称名师者甚少。钱基博先生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与外界接触极少，所以舜徽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上的一面旗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虽然不是他的入门弟子，又从事不同学科方向的研究，但经常有缘随侍左右，先生为我释疑解惑，使我获益匪浅。特别是他那种恢宏渊博的学术气象，深深地感染了我。就连他凌晨即起、勤奋治学的生活规律，也成为我终生难变的习惯。

但是树大招风，这面旗帜为时不久就变成了“白色”。

在1958年那样“火红的岁月”，“教育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舜徽先生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系乃至全校最大的“白旗”。1957年冬天，我已奉命前往当阳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每天早出晚归在大田劳动，后来又不分昼夜地巡堤抢险和大炼钢铁，根本不知道校园内是如何风云变幻。后来还是历史系革命师生担心我受不到“群众教育”，逃避“接触灵魂”，把针对我的大字报油印编辑成册，名曰《西瓜集》，厚厚一大本，我这才领略到这次批判比思想改造的批判火力更为猛烈，“上纲上线”也更为狠毒。舜徽先生在校园中成为革命大批判的围攻焦点，其处境困难与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人生何处不相逢。”他原来在西北讲学，我原来在南京读书，是革命把我们汇聚在一起。我们同属“中原人”，一开始是较受组织信任的“革命动力”，可是1957年以后又逐步滑向“革命对象”，他是“大白旗”，我是“小白旗”，形影相随，遂成难友。

在我的记忆中，1961年至1963年，知识精英们曾经过了一两年比较舒坦的日子。周恩来、陈毅等为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曾经做过许多工作，“双百方针”被郑重重申，官方

提倡实事求是学风并促进学术争鸣，高级知识分子在物资那样匮乏的岁月，生活上也得到特殊的照顾，还可以开什么放言无忌的“神仙会”：即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是也。许多老知识分子志气发舒，文思泉涌，舜徽先生的许多佳作都是在这几年付梓问世的。但是他的心情并非十分舒畅，因为1956年学术职称评审时他确实吃亏，只被定为四级教授。但当时他没有什么意见：一则是师范院校三级以上教授定额较少；二则是他的著作多半是在1956年以后陆续出版；三则是王自申院长很会做工作，经常告诫我们“中大人”：“你们应该顾全大局，以新的更为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你们是经过革命洗礼的。”由于被共产党当作“自己人”，当时确实有个别老先生放弃了解放前的教授职称。为了“顾全大局”，舜徽先生也就不屑于计较教授级别了。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教授因级别而产生的待遇差别实在太大，只有三级以上才能享受真正的所谓“高干待遇”。舜徽先生的教学与科研水平，早已超过许多三级甚至二级教授水平，但仍然多年稳定在四级不动，大家都为之抱不平，他终于直接向省委主要领导上书陈情。省委与学院对此都非常重视，当时我正好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助征集北洋史料，刘介愚书记遂委托我设法了解北京学界高层人士对舜徽先生的评价。我平常见生人就脸红，哪有此种能耐，主要是靠东苑先生个别征询陈垣等学术大老的意见。舜徽早年曾在北京“游学”，经常请教相关前辈，所以他们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后起之秀早已了解甚深。东老与陈垣等都很直率地发表了意见，既充分肯定舜徽先生的学术成就，同时也有若干诚恳的劝勉。我及时向学校党委汇报，经过相应手续，舜徽先生终于提升为三级教授，我们都为自己的前辈高兴。那时候的人都很务实，本来也未尝不可以争个二级，但能评上三级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知识精英们的舒坦岁月很快就结束了，早在1962年，已经敲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1963年就付诸行动，雷厉风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与农村暴风骤雨般阶级斗争相伴随的，则是各个人文学科的所谓“学术讨论”，名为“讨论”，实则有“讨”无“论”，一个又一个学术界的头面人物被揪出来，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加以讨伐。1964年开展的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不仅罗尔纲先生，而且连我们这些年轻学者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舜徽先生从事的文献学研究幸好离现实很远，总算还暂时保留一片静土，让他继续潜心从事自己的名山事业。

但不过一年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舜徽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未能幸免于这长达10年的民族巨大灾难。

二、难友

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以武汉大学批判“三家村”开始的，而华师则以批判陶军为起点，不过这好像都是省委内定的，照搬“北京模式”，与其说是群众运动，不如说是“运动群众”。但省委派到各校的工作组连同其操纵的革委会很快就被“砸烂”了，代之而起的是各派造反组织的群众专政，武斗与批判随之急剧升级。校系两级主要领导都被定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舜徽先生与我则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成为全校性的批斗

对象。用当时的历史话语来说，张先生作为权威是当之无愧，而我却真正是受之有愧，因为我不仅学术水平太低，连职称也不够格（高教七级讲师）。所以在全校批斗大会上，给我的黑牌上改写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黑干将”。前半截是泛指，倒也无可挑剔，后半截则是过分抬举了我。历史系学生人数不多，善于“文斗”，不擅“武斗”，这是我们“牛棚”难友们的运气。本系造反派除按过我们的头，让我们坐“喷气式飞机”以外，基本上未动手打人。张先生听说曾被打过两巴掌，但那是总务处的个别职工，全校有名的打手，对舜徽先生也够客气的了。同时，他和我的工资都被扣发，存款亦被冻结。我没有什么存款，他比较多，因为稿费多。我每月工资100元，扣60元，只发40元生活费。他被扣更多，子女又多，生活自然十分困难。当然“文革”后被扣工资都归还了。

“文革”初期，批判烽火比较集中于舜徽先生，因为他的目标确实太大。但历史系的红卫兵比较理性，惯于思考。也可能是由于在北京串连，看过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华书局等单位的大字报，经商讨认定张舜徽先生是“死老虎”，章开沅是“活老虎”；前者经过1958年“教育革命”早已批倒，后者则是中宣部黑线在桂子山的代理人，至今尚未显露原形。因此大批判的火力转而集中于我。湖北省社科界还成立了“批判章开沅联络站”，校园内的“批章”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相形之下，舜徽先生倒是显得被冷落了。他本来与我们同居“牛棚”，稍后被允许晚上可以回家。再往后连“批章”也难以继，及至军工宣队入驻，经过一段时间集中斗、批、改以后，全校（包括历史系）教工一分为三，一小部分留在桂子山坚持“革命”，大部分分别安排到大冶和京山劳动锻炼，而这三部分名义上都是斗、批、改，其实是虚有其表的斗、批、改，无非是上传下达、例行公事而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状况下，舜徽先生又有幸留在武汉，虽说已被逐出原有住房，但毕竟得以在那澡堂改造、阴暗潮湿的书房里独自伏案写作《说文解字约注》，深思熟虑、一笔不苟，据说毛笔都写秃50多支。

1986年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来汉讲学，偶感风寒，在武汉陆军总医院就医，我赶紧前往探视。他当时精神尚好，心态也非常平和，起床坐在沙发上（非如外间所说“在病榻上”）娓娓叙谈太炎先生家事及其全集出版状况。临别时特别提到1983年《说文解字约注》的出版，他曾对中州书画社极力推荐，并且充分肯定舜徽先生的勤奋与成就。其实仲荦先生在“文革”期间，因不满校园各种乱象，长期拒不下楼，其倔强性格也曾传为美谈。这些老辈学者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溶入中国固有文化，并且经由中国固有文化的涵泳，形成自己的品格与灵魂。他们与“文革”格格不入，并且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守望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绵延。仲荦先生60年代初与我在中华书局结识，以后成为忘年交，对我的教诲、关怀、提携一如舜徽先生。但没想到这竟成为最后的诀别，他回山东不过十几天就去世了。

三、芳邻

昙华林校园较小，教工宿舍容纳有限，50年代初我们原“中大人”的家属多半是就近

租房居住，租金由学校支付（供给制，自己无钱可付）。舜徽先生家属来后，由于子女较多，街道上没有适当房屋可租。幸好师母在昙华林小学任教，遂由该校提供简易平房两间，全家挤在一起。师母贤惠勤劳，把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虽然没有专用的书房，倒也窗明几净，孩子们上学与就寝后，舜徽先生依然可以潜心治学。屋旁还有闲地，师母课余种菜，先生抱瓮灌园，瓜棚豆架，自给有余，不时还送鲜菜给邻里尝新，别有一番家庭情趣，羡慕我们这些“王老五”。

我与舜徽先生来往虽多，但真正成为邻居还是在“文革”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拨给华师30万元专款在桂子山上西区盖了一栋四层楼房。有两个门栋，东头主要住校级领导，西头住资深教授，也有个别革命伍龄特长的党政干部。舜徽先生等知名教授都住进新楼，只有我这个刚提升的资历最浅的教授，也破格住了进来。舜徽先生住二楼，我家正好在其上顶楼。这栋楼虽然简易粗糙，但是有四室一厅，浴室、厨房俱全，已是当时全院最好的宿舍。我家自“文革”以来长期苦于住处逼仄，有段时间两个女儿共享一张饭桌写作与学习，妻子只能打游击。书籍的处境更差，多半只能置于柜顶和床下。舜徽先生的藏书最多，其困苦当然更甚于我。经过此次搬迁，人、书都得以意气发舒，各自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才有舜徽先生学术生涯最后那10多年的晚霞满天。

舜徽先生一家都是睦邻模范，孩子们轻言细语、彬彬有礼，师母关心年轻同事，经常介绍家常生活经验，不时还送味美泡菜并传授如何制作。舜徽先生每有新著问世，必定用报纸包好送来。他赠书的特点是从来不在书上写字，而是把敬语端端正正写在纸条上夹于书中，用意是受赠者如果用不着还可以转送给别人。后来我看到许多日本老派学者也是这样做，不像我们赠书总是在扉页大笔一挥，仿佛非要别人接受不可。我们轻易不敢打扰前辈，偶尔到他书房请教，那真是一座小图书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许多珍贵善本都有一段来历，从本地藏书家借来的贵重典籍，更是视若拱壁，精心保护。“文革”前有一两年我在北京常到“行老”（章士钊）家拜访，他的藏书更多，足足有两间大房摆满书架，但那主要是靠太炎先生的侄女帮忙经管。舜徽先生完全是靠自己陈列、保洁乃至定期养护，虽然辛苦也是乐趣。读书、爱书、敬书、护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读书人，我从他那里懂得了什么叫做“嗜书如命”。

舜徽先生举手投足都是中规中矩，非常文静儒雅，但却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勇于开创的胆识。在我的记忆中，他在1963年将旧作《广校雠略》在中华书局增订出版，已经在北京老辈学者中引起若干议论，后来又首先倡言“中国文献学”，更面临众多非议。但他毫不动摇，直抒己见，并且用自己的学术成果来回应那些反对意见，最终还是赢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学位制度恢复后，由于中国近现代史是个年轻学科，我又没多少学术积累，所以不敢申报博士点。也是他老马识途，带头申报，并且鼓励我申报，这样才为华师历史学科争取了两个首批博士点。说来惭愧，当时我还真是缺少这样带头冲刺的勇气。

他是自己苦学成才，所以也很同情爱护那些自学成才的后辈。例如程涛平，就没有读过什么正规大学，主要靠自己刻苦钻研并在楚史研究方面脱颖而出。他报考华师文献所研

究生时，我因以前与他同在《历史研究》获奖，曾略为向舜徽先生介绍相关情况。舜徽先生对程平涛非常欣赏，慨然允许报考并最终录取。事实证明，程涛平不仅在楚文化研究，而且在武汉相关历史文化景点的营造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

还有一个唐文权，原来在苏州中学教书，只有大专学历，也是靠自己苦学，在章太炎研究方面颇有成绩。他愿意离开世代定居的秀美姑苏前来从我共同治学，却受阻于教育厅“没有大学毕业证书”的责难。正好1983年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历史系看望舜徽先生与我，并且很诚恳地问我们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他帮忙。我立刻提出唐文权的调动问题，并且说：“我这个博导也只有一张初中文凭”，因为我以前两次被开除，1948年在金陵大学又为去解放区而辍学。舜徽先生怒形于色：“不应过分强调学历证书，我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呢！”司长为之动容，答应代为向教育厅转达这个意见。教育厅很快就发出商调函，唐文权如愿来到我们历史研究所，并且由于学术成果优异，没有几年就从讲师提升为副教授、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备受赞赏。

最近，我看到舜徽先生的西北挚友冯国瑞（仲翔）的《绛花楼诗集》，内有《送张舜徽教授南归》，写于1946年先生离别兰州之际。诗云：“世谁尊朴学，子独厌虚声。九畹滋沉澹，三苍力抗衡。危言宁岂废，漫夜有独行。张翰秋风感，临歧话后盟。”两位好友，一别近20年，由于冯氏早逝，“后盟”终未实现，但此诗却早已为舜徽先生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概括。这才是真正的知己！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怀念张舜徽先生

朱祖延

1992年11月27日，一代学人张舜徽先生悄然与世长辞。天不憖遗，哲人其萎，这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令人无限痛惜。如今百年诞辰，海内所瞻，共叙追怀，往事历历，犹在目前。

从1973年起，我多次同先生在一起聚会，因而得以追陪杖屦，时聆绪言。下面仅就我和先生交往中的几个片段，加以追述，以表示对先生的哀思。

1980年6月，我应邀参加湖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会，与舜徽先生同是文史组的成员。我们下榻东湖南山客舍，朝夕相处，切磋平议，一点也不觉辛劳。在会议结束后，武汉大学彭雨新教授吟诗索和，当时唱和的诗作至今尚能追忆，兹记录二首于下：

一

平湖十里绝尘埃，此日招贤馆舍开。
伯乐知心惟骏马，燕君求士有胸怀。
百家人物凭臧否，一代风流费剪裁。
惟楚有材堪作育，南山台荫北山莱。

二

名园久闭喜初开，山色湖光入户来。
愧我材疏非伯乐，欣君眼慧识真才。
精神标准详评论，教学科研细酌裁。
祝愿天公常抖擞，不教英俊没蒿莱。

舜徽先生对这些诗作也颇为赞赏，但当我请他题咏赓和时，却引发了他的一段议论：

我少年时期，也喜欢作诗填词，舞弄文墨。走上教师岗位以后，工作一忙，挤去了读书的时间，感到日不暇给，没有闲工夫再在诗词方面花力气了。古代学人提出‘善取不如善弃’，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是我下定决心，走读书治学之路，从此便与诗词绝缘。

舜徽先生在治国学方面能如此淹贯弘通，和他数十年来集中精力，绝少旁骛是分不开的。现在有人读书做学问，往往从兴趣出发，贪多务得，见异思迁，所谓“爱博而情不专”，自然难望有成。舜徽先生的这一治学经历，难道不是一面可供借鉴的明镜吗？

1984年以后，我因患癌症，连续三年住院手术治疗，舜徽先生倩人存问，关怀备至。闻我病愈康复，又亲书“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横幅一帧见赠，并有如下题记：

祖延教授大病之后，旋即康复，精神矍铄，不减于昔。此由心意宽舒，性情温厚，得养怡之道以致然耳。自此耄耋期颐，长乐无极。爰书曹孟德诗句寿之，以为康宁之祝云。一九八八年惊蛰前六日，大雪厉寒，晨起呵冻作此。颉翁张舜徽，时年七十有七于武昌。

后当我向他致谢时，他谦逊而诙谐地说：“我的字不是书法家的字，是抄书匠的字。”如今“遗挂犹在壁”，而先生音容已邈，不禁使人泫然！

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准备再版我的旧著《北魏佚书考》，我特请舜徽先生题词，先生欣然命笔，写下这样一段话：

清代扬州之学，以广博继吴、皖两派以起，由专精汇为通学，一救乾嘉诸儒固陋之弊，而清学始大。余往者特撰《扬州学记》以表章之，所以张其恢廓之功也。扬州旧领二州六县，而宝应王懋竑实开扬州朴学之先。其乡里后进继之而起者，如刘台拱、朱彬、刘宝楠、成蓉镜之流，皆经术精深，卓然名家。流风所及，至于今不绝。

宝应朱祖延教授，生于其邑，自少习闻其乡先辈绪论，故治学严谨，朴实无华。以文学施教于大学者积数十年，为多士所宗仰。犹于讲学之余，造述不倦。著作刊布已多，《北魏佚书考》其一也。是书博征一代文献，搜考千载遗篇，俾早佚之书，复见著录，有裨于学术甚大，非第订补王谟、马国翰诸家所辑之缺漏已也。书既印行，犹欷然不自谦，复为《补正》以勘订之。自标“引书割裂”、“考订不周”、“体例不纯”、“文字舛误”、“佚文漏辑”诸目，以自攻其短。有如老吏判狱，丝毫必究，可谓勤于自讼矣。即此一端，足为学者楷式。沾溉士林，至无穷尽。余读其书而善之，因题数语于简端，以志赞仰云。

文中的奖掖之辞，未免溢美过誉，个人是愧不敢当的。但先生娴习清儒学案，随事而发，说来委曲详尽，如数家珍。若非博学通人，又怎能取之左右逢源如此！

最使我难忘的是舜徽先生为我主编的《尔雅沽林》一书的题词。兹将题词全文移录于后：

自传注既兴，而后有训诂之学。《尔雅》一书，乃汉初经生哀录众家传注而成。后人以其可取以解经，故附之群经之后耳。魏世张揖因《尔雅》旧例，博采汉儒笺注及《三苍》、《说文》诸书以增广之，名曰《广雅》。深恐其书不为时人所重，乃推尊《尔雅》，谓为周公、孔子遗书，以明己学所自出，此乃后人托古之陋习，不足信也。顾其书条理缜密，包罗数广，世之探索训诂名物者悉宗之，其与群经并重久矣。余早岁治《尔雅》，始读郝氏《义疏》，继观邵氏《正义》，于邵书尤为服膺。邵书善矣，第草创之初，虑犹有罅漏；又其成书甚早，后出之义转多。拟广采他家，兼下己意，为《尔

雅邵疏订补》以总会之。甫及一卷，终以他事间之，未能成也。吾友朱祖延教授，以文字训诂之学施教上庠，慨然以主编《尔雅诂林》自任。鸠合同志，分工协作。外至各地采访，归而伏案整理，不数年而书成。弘编巨帙，蔚为大观。则吾人所欲遍睹之旧疏新解，悉在其中矣。自此治雅学者，不必广求他书，而众说毕备。嘉惠士林，夫岂浅鲜！祖延教授以七十高年，身多疾病，而犹夙夜在公，与诸同志搜辑排比，区处而条理之。积历岁年，克底于成，其精神毅力，为尤不可及也。

先生此文，托张三夕同志转交给我，并附来口信说：“《尔雅诂林》出版，要好好庆祝一番。建议开个发布会，请朱先生办两桌饭，我要来的呵。”岂料不出旬日，而先生遽归道山。展读遗文，竟成绝笔，而先生言犹在耳，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严酷事实啊！

日月轮转，世事变迁，舜徽先生虽已驾鹤西去多年，但他音容宛在，德音未远。先生一生襟怀坦荡、淡泊名利，在国学领域沉潜书卷，伏案数十载，始终以一顆赤诚之心为学界奉献智慧和力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严谨治学、精心育人的态度将激励后学勤勉探索、热心奉献。

敬爱的舜徽先生，我们永远怀念你！

（朱祖延，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